战略纵横

我们为什么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

■何 雷

引言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年前夕，中国政府发表了《新时代的中国国防》白皮书。新的国防白皮书庄严宣示了新时代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基本立场、观点和内涵，对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和国防意识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防政策的正确认识，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忧虑，有力驳斥和严正回击“中国威胁论”“中国军事威胁论”等谬论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新时代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

新中国成立70年来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。无论是在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改革开放时期，还是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，中国都是一以贯之、毫不动摇地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。新时代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更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。

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为根本目标。中国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，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。坚决慑止和抵抗侵略，保卫国家政治安全、人民安全和社会稳定，反对和遏制“台独”、实现国家完全统一，打击“藏独”“东突”等分裂势力，保卫国家主权、统一、领土完整和安全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、重大安全领域利益和国家海外利益，支撑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首要职能使命和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。

以坚持永不称霸、永不扩张、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为鲜明特征。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发展，始终以满足国家安全的正当需要为基本原则，坚持结伴不结盟，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，坚决反对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，坚决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霸权主义。中国不走一些西方国家追逐霸权、“国强必霸”的老路，而是坚定不移地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协调的和平发展之路。中国国力和军力无论怎么发展，发展到什么程度，都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。

以贯彻落实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为战略指导。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基本精神是实行积极防御，坚持防御、自卫、后发制人，坚持“人不犯我、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、我必犯人”，坚持全民国防，创新人民战争战略战术，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；强调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，强调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相结合，强调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。

以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为发展路径。建设同国际地位相称、同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，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。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，党的十九大报告为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了新的“三步走”发展战略安排。到本世纪中叶，当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时候，人民军队则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，中国的国防将全面增强、坚如磐石。

以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意义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，已被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和接受，也为中国国防建设赋予了更加广泛的国际意义，为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运用提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任务要求。中国是忠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负责任大国，中国军队积极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，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积极服务和可靠保障。

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是中国国情决定的

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，不是权宜之计，而主要是基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、国家的内政与外交、国防的目的与手段等基本国情作出的必然选择。

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要求。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、霸权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、国防政策，有着本质的不同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明确规定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，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、互不侵犯、互不干涉内政、平等互利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，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，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、文化交流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同时还明确规定，中国武装力量的任务是巩固国防，抵抗侵略，保卫祖国，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等。从中可以看出，防御性国防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使然，是中国武装力量使命任务的应有之义。

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。政治决定军事，政略决定战略。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，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。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，必须走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。国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方面，根本目的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，因此需要且必须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，而不是其他。

近代以来国家饱受欺凌侵略的深刻反思。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10年间，中国备受西方列强侵略和欺凌。新中国成立，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。饱受侵略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，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，热切期盼繁荣安定的幸福生活，深深懂得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性。中国绝不会把自己曾经受过的战争和灾难强加给其他国家，也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再侵略我们的国家，欺凌我们的人民。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。中国是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，中华民族是勤劳、勇敢、智慧、善良和爱好和平的民族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“和为贵”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，把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视为战略指导的最高境界，两国相争时把“伐谋”“伐交”作为上策，“伐兵”和“攻城”当成下策，等等。这种“和合”“止戈”的传统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。

始终不渝为捍卫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作贡献

事实胜于雄辩。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讲诚信、守信用的。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不仅写在法律中，更落实在行动上。

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过战争和武装冲突。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。新中国成立70年，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日益强大。尽管如此，中国却从没有侵略过任何一个国家，没有占领过别国一寸领土。与个别邻国发生的为数很少的边境武装冲突，都是在国家领土主权、海洋权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侵害，和平手段全部用尽的情况下，迫不得已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，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。

中国一贯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。中国领土陆海兼备，是世界上邻国最多、陆地边界最长、周边安全环境最复杂的国家之一。中国始终致力于用谈判协商、和平方式解决与一些国家存在的领土纠纷和海洋划界争端，目前已与14个陆地邻国的12个解决了边界问题，与有关国家在海洋划界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共识，总体上是陆地边界基本稳定，海上争端趋稳向好。

中国始终坚持“和平统一、一国两制”的基本方针。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国家。解决台湾问题，实现国家完全统一，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。中国政府始终坚持“和平统一、一国两制”的基本方针，以最大诚意、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；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，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，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“台独”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，绝非针对台湾同胞。直到现在，仍然以最大耐心，期待着与台湾同胞共谋和平、共护和平、共享和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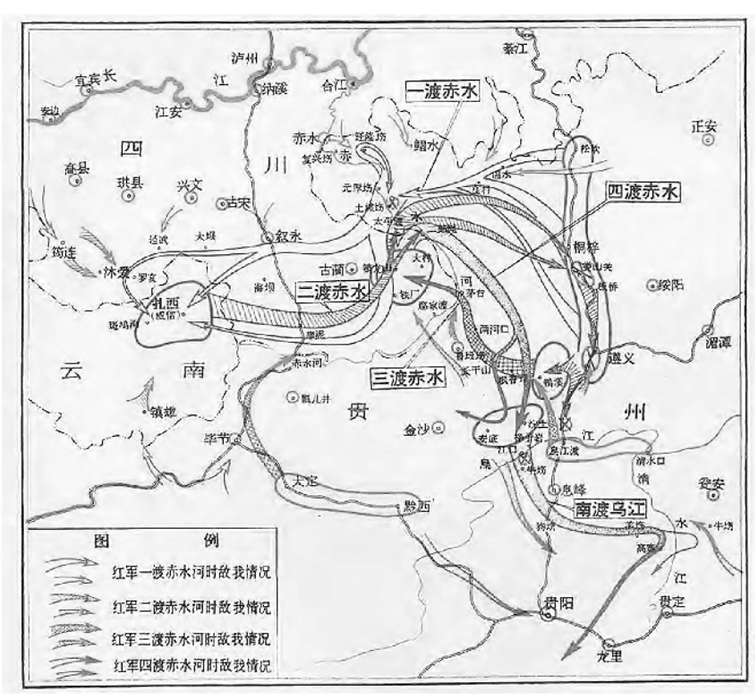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积极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与义务。中国坚持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的安全观，把自身安全与世界和平发展紧密联系起来。中国军队积极推进新时代国际军事合作，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、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贡献。多年来，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，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资国之一。截至2018年12月，中国军队已累计参加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，派出维和军事人员近4万人次，13名中国军人牺牲在维和一线。中国积极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，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。2012年以来，中国军队组织或参加马航失联航班搜救、菲律宾“海燕”台风救援等多项行动，受到当事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。

当今世界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，繁荣富强、安全稳定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。新时代中国国防将顺应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，立足中国国情军情，始终不渝地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，全面建设巩固国防和世界一流军队，坚决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，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（作者系军事科学院特聘首席专家、研究员）

四渡赤水：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

■韩金强



战斗简介

四渡赤水战役，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，为争取战略主动，在贵州、四川、云南三省交界地区，成功进行的一次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性战役。此役，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开始，到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，历时3个多月，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、2个旅另10个团，俘敌3600余人。在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、朱德等的领导下，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，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的企图，导演了一幕精彩绝伦、威武雄壮的活剧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，是我军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典范。

讲评析理

依据敌情变化，及时调整作战方向，稳握战场主动权。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，或东出湖南同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，调集了150多个团，近40万重兵，欲将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地区。而此时的中央红军只有16个团，3万余人，面临着前有长江天险，后有重重追兵，头顶上飞机袭扰的极端险恶形势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，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，以开创川西或川西北根据地。但是红军一渡赤水后，由于敌情急剧变化，川军刘湘采取了“北守南攻”的两面作战方针，即对川北红四方面军采取守势，对进入川南的中央红军采取攻势。面临各路敌军奔集川南、四面围追堵截的新情况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当机立断，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，在扎西地区集结，以保存军力，寻求新的机动。

四渡赤水之战，如果没有中央红军在川南改变原定渡江计划，转向川黔滇交界地区机动作战，那么也就没有以后北渡金沙江的可能。这告诉我们，红军虽然在一个方向暂时放弃了原定计划，但却在另一个方向为实现原定计划创造了条件，最后终于达成预定的战略目的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高超指挥艺术的卓越之处。

灵活转换作战形式，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。1935年2月16日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《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》中指出：“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，有时向东，有时向西，有时走大路，有时走小路，有时走老路，有时走新路，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。”当各路敌军奔集扎西时，红军突然调头东进，二渡赤水，挥戈东下，再打遵义，歼灭和击溃敌2个师又8个团，俘敌3000余人，缴枪2000支(挺)以上，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。蒋介石哀叹这是“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”。遵义战役后，当蒋介石亲飞重庆指挥围剿，妄图歼灭红军于遵义、鸭溪狭窄地区时，红军又向西走了，三渡赤水，佯作北渡长江之势，迫使敌人重新调整部署。当敌人部署尚未就绪时，红军又出敌不意地四渡赤水。红军南渡乌江，佯攻贵阳，调出滇军，接着来了一个大迂回，乘虚直插云南，示形于昆明，巧渡金沙江，使我军转危为安。

四渡赤水作战，如果红军没有向扎西的“走”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，就不可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；如果没有以后三渡、四渡赤水的“走”，就不能加深敌之错觉，牵着敌人的鼻子打转，就不能把敌人拖疲、拖垮，使我乘隙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。这告诉我们，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灵活机动地运用大规模的运动战，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，以开辟道路，走中有打，打中有走，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，是为了保存实力，待机破敌，把走与打、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辩证地统一起来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。

巧妙运用虚实行动，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。遵义战役之后，红军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，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围集。当敌军逼近时，红军三渡赤水，重入川南，以红第九军团向叙永、古蔺方向继续前进，伪装主力，造成北渡长江的假象。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渡江北上，调整部署，企图对红军再次形成包围，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。正当敌军向川南奔集，其包围圈将成未成之际，中央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，于3月21夜至22日15时，分别从古蔺二郎滩、太平渡、淋滩、九奚口等渡口，第四次渡过赤水河，神速南下，进到遵(义)仁(怀)大道北侧地区，除红九团于乌江北岸继续牵制迷惑敌人外，红军主力于31日南渡乌江，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。

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，造成敌人的错觉，实现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战略目的，毛泽东在部署红军作战行动时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。红军主力经息烽、扎佐佯攻贵阳，突然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，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里的飞机场。在红军的威慑下，坐镇贵阳的蒋介石眼看贵阳城守备空虚，惊慌失措，手忙脚乱。于是，急调滇军龙云的主力3个旅昼夜兼程，增援贵阳，急令薛岳兵团和湘军何健部在川黔湘边界布防堵截。同时，严令周浑元部向东尾追。当各路敌军继续东调之际，我主力却从贵阳、龙里之间突过敌军防线，向南而后向西急进，威逼昆明。但是，红军并未攻打昆明城，而是虚晃一枪后，乘追敌在红军后侧，金沙江两岸空虚之际，掉头北上，直指金沙江边，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。至此，中央红军终于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交界地区的狂妄计划，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，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。这也告诉我们，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运用示形诱敌、声东击西、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，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，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，其军事思想与领导指挥艺术，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
（作者单位：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研究中心）

从墨翟“解带为城”说起

■吴敏文

挑灯看剑

●一种“战争迷雾”散去，无数种新的“战争迷雾”更加浓厚地笼罩过来，真正的战场透明从来没有过，也永远不会有

春秋战国时期，公输般为楚国制造出装了轮子可以移动的强大云梯，楚王计划借此去进攻宋国的都城。楚国是大国，很富有，人口也很多；宋国是小国，很贫穷，人口也较少。但宋国军民团结，决定死战以保卫自己的国家。墨翟知道了这个情况，就想劝阻楚王的攻宋计划，以免生灵涂炭。公输般相信自己所造云梯的威力，认为可以轻取宋国。墨翟不以为然，两人在楚王面前“解带为城”进行了对抗演练。结果是“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，子墨子(即墨翟)九拒之”。因为墨翟的随机应变之策，加上了解到宋国军民众志成城严阵以待，楚王最终放弃了进攻宋国的打算。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，是墨翟的机变，改变了楚国的进攻计划。

战争史毫不留情地表明：任何刻板、呆滞、保守、侥幸的军事思想，都会在变幻莫测的军事对抗面前沦为笑柄。无论是中国古代的长城，还是伊拉克战争中的“萨达姆防线”；也无论是晚明防御清军的关锦宁防线，还是二战前法国人斥巨资修建的马其诺防线，都是刻板而不求变的落后军事思想惨遭失败的代表。

在军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王国，机变总是具有无穷的军事魅力。《孙子兵法》云：“故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。”萨尔浒之战被称为清朝的“立国之战”。面对明朝军队数倍于己的优势兵力对萨尔浒实施的“四路围攻”，清军确立了“凭尔几路来，我只一路去”的灵活战术，先拣弱军打，然后乘着胜势各个击破，取得大胜。萨尔浒之战之所以被称作清朝的“立国之战”，即从此以后，明朝军队就失去了击破清军的机会。

我军著名战将粟裕将其制胜原则归纳为：在什么地方有利于消灭敌人，就在什么地方打仗；在什么时间有利于消灭敌人，就在什么时间打仗。粟裕将军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语，高度而准确地概括了他高度机变的军事制胜思想。1947年5月，在敌人重兵包围下，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于强敌环伺的缝隙之中，将敌军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全歼于孟良崮地区，堪称“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”。取得如此胜利，粟裕灵活机动、善于机变的战略战术功不可没。

有人以为，现代战争中，多维空间无所不在的传感器严密监视整个战场，大数据、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信息处理和辅助决策系统，不仅能够形成精确、实时的统一战场态势，而且算无遗策地预测战场态势走向，形成有利于我、不利于敌的单向战场透明。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打仗，就像是“玻璃瓶子里赌宝”，胜利十拿九稳。

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不管技术如何发达、技术手段的运用怎样广泛而有效，在“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”，对抗手段全域化、高技术化的现代战场上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一种“战争迷雾”散去，无数种新的“战争迷雾”更加浓厚地笼罩过来，真正的战场透明从来没有过，也永远不会有。

因此，面对没有料到的突发状况所需要采取的临机应变，不仅永远是克敌制胜所需，而且堪称永恒的制胜秘诀。